

一个歌者的浩茫心史

——张炜的《散文随笔年编》
文/孟繁华

《万松浦记：张炜散文随笔年编》
张炜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2010年,张炜的《你在高原》获得了第八届“茅盾文学奖”。铁凝评价这部小说是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。认为“作品对于人类发展历程的沉思、对于道德良心的追问、对于底层民众命运和精神深处的探询、对于自然生态平衡揪心的关注等方面,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
不久前张炜又出版了他十八卷本散文随笔集《万松浦记：张炜散文随笔年编》。

当然,一个作家是否伟大,并不取决于他创作数量的多少——唐代诗人张若虚的《春江花月夜》,孤篇横绝一首冠全唐。但是,这个极端的例子只能发生在古代中国;进入现代之后,“鲁郭茅巴老曹”除了他们文学的天才和思想的深邃,如果没有等身的著作,要想在灿若群星的民国作家中脱颖而出并成为百年中国经典作家,几乎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创作数量在今天同样是对作家考量的重要指标。当然,我要说的不是这些。在我看来,“张炜散文随笔年编”的重要,诚如出版者所说,它表达了“中国文坛最沉静最纯粹的精神守夜者”几十年的精神历程,它是一个“心事浩茫”的歌者对“隐匿心史”的“畅谈录”,是一个“奔跑女神”“芳心似火”的“纵情言说”;当然,它是一部有根也有来路的大书——它的根,就是张炜的故地万松浦,它与张炜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有关;它

的来路,就是从故乡出发的张炜,面对三十余年的中国历史和个人精神履历的浩茫歌吟与记录。

要全面评价张炜的精神履历和记录是不可能的。这里我只想讲一点,这就是1993年的张炜。1993年,知识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。在这场讨论前后,张炜发表的几篇文章不仅预感到“1993年好像是很特殊、很重要的一年,起码对于文学是这样。在新时期文学的短暂历史上,哪一年也没有这一年怪:像开端又像结尾,很匆忙又很迟缓。”(《九三年的操守》)“现在国家正在发生很重要的事情,出现了很多陌生的东西。原有的话题不再令人感兴趣。无论是就一个人、一种心境而言,随着时间的延续,人们都可以走进这样一个感觉:对很多事情正在失去热情……表现是多方面的,主要一个是无言。”于是他愤懑地发问:“诗人你为什么不振怒?你还要忍受多久?快放开喉咙,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!我不但是痴迷于你的吟哦,我还要与你同行。”而且他的一些文章也成为这场讨论具有代表性文章的一部分。比如《文汇报》发表的《抵抗的习惯》等,他号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“抵抗投降”。对他个人而言,他能寻找的只是“忧愤的归宿”：“即便到了今天,即便人类心灵上的秩序如此混乱,高贵与卑贱之分还会依然存在。我们仍然这样认

为,并以此抵挡着自己的堕落,也抵挡‘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’的孤寂与忧伤……”这就是一个歌者在1993年前后的浩茫心史。

说张炜是一个“歌者”,是因为张炜本质上是一个诗人。这并不是说张炜在他的行文中多用诗人的语言方式和情感方式,重要的是张炜的理想主义情怀。面对一个红尘滚滚的世界,他有“抵抗”的勇气和决绝。九十年代,张炜写了一篇《心上的痕迹》的文章。他说:“现在不断有人怂恿人民去经历金钱的冒险体验,去消受可能来临的豪华和富丽,其实这是虚幻的泡沫。那些没有根基的楼堂、华丽的宫殿都会倒塌,那些刺耳的音乐也会中断。一个民族如果走入了不幸的狂欢是非常可怕的。”张炜不是一个“先知”,但是将近二十年过去之后,张炜所说的这些不期而至——当下的中国仍然走在这条冒险的路上。

张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,是一个有强烈批判精神的作家。但是,面对中国现代性“未竟的方案”,他又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作为作家可以呈现他所看到的,他不能或难以改变这一切。但是,作为一个歌者,他依然在歌唱,依然芳心似火“纵情言说”。这就是张炜对历史、自然、爱情、友谊、风俗、哲学等的畅想。这当然就是我们想象和期待的张炜。■

《朗读者》
[德] 本哈德·施林克 著
钱定平 译
译林出版社



直指人性深处

文/王抗美

《朗读者》一书读完,只觉像钝器重重划过内心,有一种虽不尖锐却无以名状的疼痛。

故事发生在二战后的德国。某大学法律专业学生米夏到法庭旁听时发现,那几个被追溯当年转移途中,在充当临时监狱的教堂被炸失火时不肯开门,以致大部分犯人活活烧死的罪行的纳粹监狱女看守中,一位名叫汉娜的,竟是他少年时不告而别的恋人!

她曾在他放学路上突然犯病时帮助过他,在后来的交往中,情窦初开的他爱上了这个比他大21岁正当风姿绰约的女性并有了肌肤之亲——他还发现,这个喜爱书籍并一直让他为她朗读的前恋人原来是个文盲!她只要承认这个事实,就可以洗刷掉本不属于她的罪名,可她却宁愿被判18年重刑也不愿接受检察官“核对笔迹”的提议……

她在狱中学会了简单的读写——为何当年不学?书中没有答案。毕竟,人生很多事情是说不清的——却在出狱前一天自杀,留下遗言,让当年那场大火幸存者来处理她那7000多马克的遗产。可这位幸存者不愿把这钱用在与大屠杀有关的事情上,因为那对她来说“倒像是一种宽恕”,而宽恕是她“既不能给也不允许给的。”但她留下了汉娜用来装杂物的茶叶罐,因为她曾有个同样的小罐,在集中营丢失了。这是一个幸存者的选择。

有位学者曾说过:“宽恕不是将非正义的过去一笔勾销,一忘了之。宽恕是对过去的人际恩怨不再计较,但不予遗忘。宽恕应当对被宽恕者有约束作用。被宽恕者理应诚心接受宽恕,并与宽恕者一起建立一种高尚坦诚的关系。”汉娜已不能受到约束,也不能与任何人建立关系了。与惨痛记忆相伴的仇恨,却没有因死亡而消弭。而米夏,却仍为“是否不是别人而正是我本人要对她(汉娜)的死负责?”的问题所困扰。

不管出于何种动机,米夏都没把汉娜是个文盲的证据告知法庭,眼睁睁看着她为不是自己的罪行承受了额外刑期。这也许是种“政治正确”的选择,但他仍为他的初恋付出了代价——他对自己的婚姻始终不满意而以离婚了事。从此,他虽没去监狱看汉娜也不给她写信,但给她朗读和录音音带(当年她曾不断选择将要送入奥斯维辛的“犯人”为她朗读书籍),却成了他生活的重要内容——“纳粹罪恶的遗留就这样以一种意想不到的、不可挽回的方式,进入了一个年轻男人的生活。”

其实,又何止“一个年轻男人”?作者是用隐喻的方式,告诫年轻一代德国公民,在曾经产生过希特勒和纳粹的土地上,没有人能置身事外。

在得到幸存者同意之后,米夏以汉娜的名义把那笔钱汇给了“犹太人扫盲联盟”。在收到该联盟“对于汉娜·施密茨女士的捐赠深表谢意”的短柬后,米夏带着它去了公墓,“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,站在汉娜的墓前”。他能就此和她彻底了断吗?没人能说清楚。

这是一本直指人性深处的书。严谨而认真的思考,也许有助于每个德国人自觉地承担起个人责任,防止悲剧再次发生。这,或可成为我们的借鉴。■

慢读《骑兵》

文/胡丹娃

《骑兵》
苏童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很晚才读了苏童的短篇小说集《骑兵》。刚读时听见自己的笑声,因那带有苏童指纹的慧妙语言。渐渐,心里发酸,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往事被《骑兵》一一唤起,由《白雪猪头》想起过年前清晨四点钟我拎着菜篮去菜场排队买肉,由《像天使一样美丽》想起我们爱美女孩常去的照相馆,由《木壳收音机》想起家里的一台收音机……

《骑兵》弥漫着悲喜剧气氛,而且越读这感觉越浓。在这样的氛围里,立着一个个命途多舛、桀骜不驯的少年。《骑兵》里的“我”常常是故事的配角,有时还是主角,这个“我”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,然而自始至终有一个在西窗边看风景的“我”,这少年总坐在那里。在他平静的讲述里,时光呈现出本来具有的光华,仿佛日子从来就是那样。“壶里的水,壶里的日子,好多冷水烧成了开水,日子也一天天过去了。”读苏童的小说,听得见回响在文字间的雷声,看得见开放在文字间的花儿,雷声不大,却能穿越文学赴约者的感官,花儿不艳,却呈现一片芳华,正好像自然界所见到的。他的小说是历史视角与童年视角并存的,正好像雷声和花儿的关系,读《骑兵》,我常在不经意间被雷声和花儿击中。苏童是一位具有符号学意识的小说家,那些由物构成的符号自由跳动在小说

里,即便三笔两笔,也被赋予了雷声与花儿的气息。他珍视并抓住那些具有时代标志的符号,用以表达自己对历史和时光的敬意,并将你带入冥想与神思。《骑兵》中的二十个短篇,几乎无一具体交代故事所发生的年代,但每篇必有特定年代所特有的标志物,那些物不仅包括可以唤起我亲切回忆的猪头、古巴刀、回力牌球鞋、灰呢绒鸭舌帽,还包括分布在香椿树街的特色店铺,例如白铁铺、布店、纸扎店,还有那些不时出现的工厂,例如水泥厂、化工厂、五金厂,包括铁路边的贮木场,等等。读《骑兵》仿佛走进博物馆,也像在看老照片,但那些物那些画面又并非是静止的,它们全被赋予了生命和感情。同时应了苏童慧妙的语言表达,无论他写到什么物,那物都呈现出深刻的肌理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。但苏童不为物而写物,他写到物必因他怀念它尊敬它,而且他用到它,必让它活起来。苏童的符号体系里有很多由男性目光积蓄起来的,例如,少年之间的利器、看不见的战线中的球鞋,象征力量的哑铃石锁、铁道边的鸟笼、欲飞欲奔的纸马,甚至河流两岸的民居、店铺、水上的船只,等等,全经过了他男性目光的过滤,即便对一把伞的打量,也投以了男性的神志和情肠。以往评论家谈到苏童的小说时用了“女性化”三个字,而我

读到的《骑兵》恰是男性化的,它以男性的叙述方式打动了我这个在“西窗”这边读书的女子。苏童也是博学的,看看《骑兵》中二十个短篇各各涉及的行业,包括那些随处可见的物,所需知识面、观察力、记忆力及还原功力,非一般人所能及。人们一向认为苏童的小说中有一种阴柔潮湿的南方氛围,我想,所谓南方氛围,很可能只是苏童的一种符号策略,在这种氛围下,苏童自由驰骋。他对符号的运用应该不只来自他的文学策略,更来自他对历史和时光的感情;他是怀旧的,我从《骑兵》里读出了这些。

《骑兵》打动我的还有,它不美化,不粉饰,不因历史成了时光就简单地给它抹上温暖的底色。苏童的笔像一把刀,直插少年人的人性深处,拔出的刀尖上常挑着少年人内心深处最脆弱最残酷最可怕的东西。《骑兵》里的孩子要搁到现在,都算得上是问题少年,但苏童告诉我,人无法简单以美丑而论,人性中尚有许许多多未知的谜,生命是脆弱的,韶华不会再来,悲剧却可以重演。苏童的笔也是一枝轻盈的鹅毛笔,偏还让我不时想到尼采那句有些沉重的话:“我的公式是热爱命运”。而在小说中,他并不发表观点,只让你读,读出荒诞,读出悲喜,读出意味,读到心发疼,或者心开花。■